

毛泽东文化思想中的湖湘文化因子

沈学珩

内容提要 毛泽东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湖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毛泽东成长的重要时期都是在湖南度过的,其思想、个性的形成过程深受湖湘文化的熏陶和浸润,其以湖湘文化为依托,以重本思想和实学态度提出为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文艺目的,以兼容并包的情怀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以独立根性的“恃己”精神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原则,完成了对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构建,使得毛泽东的文化思想蕴含着丰富的湖湘文化因子而更具特色。

关键词 湖湘文化 毛泽东文化思想 吸收 因子

沈学珩,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210023

湖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十分突出的一支地域文化,其民为邦本的重本思想、经世致用的实学态度、兼容并蓄的包容情怀、独立根性的“恃己”精神,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积淀成湖湘文化的基因,孕育出一代又一代的湖湘豪杰。毛泽东成长的重要时期都是在湖南度过的,其思想、个性的形成过程深受湖湘文化的熏陶和浸润,毛泽东从其生活的地域文化中汲取资源,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以重本思想和实学态度提出为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文艺目的,以兼容并包的情怀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以独立根性的“恃己”精神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原则,完成了对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构建,因而毛泽东文化思想深深地打上了湖湘文化的烙印。

一、民本思想与“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

文艺为什么人服务,是一个根本原则的问题,它决定着文艺的性质和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坚持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核心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该是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1]。毛

[1]《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属于人民,文艺必须根植于广大劳动群众之中的唯物主义观点,提出人民大众是文艺的主体,前所未有的突出人民大众的历史地位。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曾提出“文化和文艺要为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1],毛泽东强调文化的大众性服务方向既是马克思文艺理论的方向要求,也是湖湘文化中浓厚的“民本”思想对毛泽东影响的体现。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湖湘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民本”即认为民众是立国之本的重民思想,其历史渊源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尚书·五子之歌》中记载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湖湘文化源头之一的楚文化中就有一股质朴自然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民本思想,湖湘学派代表人物大多经历过生灵涂炭、激烈动荡的历史时期,了解民心的好恶、向背是政治统治兴衰存亡的根本。王夫之从亡于乱世的明朝社会现实,肯定民众力量的强大:“君以民为基……无民而君不立”^[2];曾国藩也提倡“内圣外王”、“民胞物与”的民本思想;谭嗣同立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续王子之绪脉”^[3]。湖湘文化蕴含的民本思想,通过王夫之、曾国藩、谭嗣同等人的发展和杨昌济等人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成长于湖湘乡村环境的毛泽东,以农民本色的思维方式、情感态度和认知心理,关注社会基层,理解、同情农民生活疾苦,一生追求为人民服务,追求大众化、人民性,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坚持走群众路线,直接催生其大众化文化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在继承湖湘文化中深厚的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宗旨,这种文化是为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所有,不是为少数特权者服务的。文化服务的大众化方向的提出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人民大众一直是受剥削、受压迫和被启蒙、被同情的对象,始终没有成为文化舞台的主角与主体,文化主流多是脱离人民大众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贵族文化。针对部分文艺工作者对同工农兵结合的思想准备不足,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倾向,毛泽东要求文艺工作者从改变世界观方法论入手,“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在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4],只有回归大众,才能创作出真正属于人民的文艺。如果对群众缺乏了解,缺乏深厚的感情,“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5]。“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6]对文艺创作的根源在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还是作家的心理创造,毛泽东强调人民的社会生活实践是文艺创作的源泉,“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7]要实现文艺为工农劳苦大众方向,必须走深入生活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强调文学艺术家无条件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上前线,下乡去、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汲取丰富的源泉,虚心的向人民群众学习,再到群众中宣传,为人民而创作,为人民所利用,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的文化艺术问题,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只有“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8],才能创作出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典型形象。

[1]《列宁论文学艺术》,〔北京〕人民文学1983年版,第434页。

[2]《船山全书》第1册,〔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074页。

[3]《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4页。

[4][5][6][7][8]《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页,第851页,第846页,第860页,第860-861页。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从人民利益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群众观结合起来,要求文艺工作者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和“新”的群众以及“新”的时代相结合,从根本上解决文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作家个人和人民群众关系的原则问题,真正树立了以人民为本位的文化核心,以人民大众为创作主体,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和权益。从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人民大众”到后来邓小平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双为”方向,习近平在近期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文艺“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精神,足见毛泽东立足民本思想,提出的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在今天的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意义。

二、经世致用与“文艺为政治服务”

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中,始终把文化的政治性放在首位,他认为文化作为一定阶级观念形态的反映,其内容必须为所代表的阶级服务而具有政治性。毛泽东从文艺的政治教化功能出发,强调文艺文化要成为无产阶级手中的武器,要为改造国民服务,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政治任务服务。“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毛泽东文化思想中强调文艺的政治功利性发挥与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的传统是密不可分的。

中原的儒家文化是湖湘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从胡安国、胡宏父子开创湖湘学派开始到王船山、曾国藩、魏源的发扬光大,他们的学术道统都以孔孟之道为目标,体现着儒学的正统特色。经世致用,作为优良传统学风和实用主义特征的概括,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主要精神和内容,也是湖湘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湖湘学派代表人物多生活于社会动荡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历史时期,他们不尚空谈、崇尚实学,有强烈的参政意识,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解决现实中的实际问题,因此湖湘文化中政治意识极为浓厚,蕴含着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情结。从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到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海国图志》,都以研究历史治乱兴亡,寻求经邦治国为根本,主张学术应面对现实,致力于关乎救国救民的国计民生,湖南士人价值取向均以政治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到了近代尤为明显,湖湘文化传统中“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和经邦济世的情怀,对毛泽东的文化观影响颇深。

儒家文化是一种政治伦理取向和道德教化突出的文化,以对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影响程度作为衡量标准,它注重文学的社会功用,把为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服务作为出发点,形成了“美刺说”、“文以载道”等教化传统,到了瓜分豆剖的近代中国,启蒙与救亡成了时代主题,文学被视为改良国民性的武器,成为改造社会和人的思想观念的重要手段。湖湘文化代表人物往往诞生于社会动荡之际,因此它非常注重对传统文化中的功利性的继承和发扬,文学作为武器成为手段。1917年毛泽东在与蔡和森一次对话中萌发了要借助文艺的力量来改造国民思想:“现在国民性情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2]对毛泽东探求学问、人生追求影响巨大的杨昌济先生,特别强调人的精神力量的主观能动作用在改造社会活动中的决定性意义,直接影响了毛泽东,成为毛泽东知行观和实事求是思想的关键媒

[1]《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页。

[2]《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39页。

介,促其吸收传统文化中文以载道的思想养料,强化文化改造社会的功能发挥。

近代中国饱受战争之苦,无论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面临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军事上的打压和文化上的专制,政治教化必须依赖文艺的传播路径,才能充分发挥文艺的教育、团结、激励作用,宣传为政治服务的思想,所以毛泽东提出革命文化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使文化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发挥革命文艺在当时生产自救和救亡图存中的积极作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1]。毛泽东这一主张对于宣传抗日救亡、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坚持、反对投降、妥协、卖国,争取和平、民主、团结,配合人民解放战争顺利进行,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毛泽东在建国前强调文化为政治服务,有其时代背景和现实意义,但在建国后,国内外形势、社会矛盾和主要任务都已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毛泽东仍然强化文化为政治服务的思想,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判定文化战线上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通过“洗澡”等方式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渐至极端的发动一场从根本上解决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命运前途的“文化大革命”,达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理想社会政治实践,与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政治情结是有关联的,把文化完全作为承载政治理念的工具,是毛泽东晚年文化探索中的一个显著的失误。

三、兼容并包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离不开包容和开放,需要有开阔的视野和海纳百川的胸怀。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后,国内科学文化领域内存在的某些“左”的思想影响,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打棍子、扣帽子的情况时有发生,妨碍着艺术和科学的良性发展,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和文化事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主张减少行政干预,兼容并包。在科学和艺术工作中要自由地辩论,鼓励文化工作者自由地发表见解,这样才能博采众家之长,为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服务。“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2]“特别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为八股。”^[3]毛泽东“双百”方针的提出与湖湘文化兼容并包的内涵影响有一定的关联。

湖湘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在于它具有博采众家的开放精神和兼容并包的融合态度。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楚文化,是在与其他地域文化的交融中发展起来的,楚国初创时期疆域狭小,民族众多,与王室没有血缘姻亲,在几百年的兼并战争中,楚人利用处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交叉地域,以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逐渐融合了地貌、风俗、习惯、制度、生产方式等大多数处于原始社会的蛮夷民族文化,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实现着文化的交融与汇通,形成五彩斑斓、独立强盛的楚文化,也为湖湘文化的崛起提供了强劲的文化基因。湖湘学派代表人物也很注重文化的开放与融合,求同存异,自觉打破不同学派之间壁垒森严的门户之见,在学术思想上充分沟通与融合。周敦颐融合儒、佛、道三种文化经义创立理学,在中原传至二程之后,由胡安国父子传入湖南,至胡宏和张栻创立的湖湘学派,在继承二程洛学基础上,融合陆王心学的影响,才得以奠定湖湘学派“道南正脉”、“潇湘洙泗”的地位和道统。张栻与朱熹在岳麓书院举行的“朱张会讲”,

[1]《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2]《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8页。

[3]《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

首开湖南自由讲学之先河。明末清初,王夫之对佛、道两家进行深入考察研究,以“天地以和顺而为命,万物以和顺而为性”^[1]的包容性,继承不同学派的合理内核,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开拓精神,创立了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相结合的理论体系,把湖湘文化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哲学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到了近代,魏源也主张“君子之用世也,道不必尽同,智士之同朝也,辙不必相合”^[2],杨昌济则主张:“合东西两洋文明一炉而冶之。既不欲为专宗孔子,罢黜百家之愚,复不欲为攘斥佛老,驳击耶回之隘。”^[3]湖湘学派因兼容诸学之长方自成一派,博采众家的开放精神和融合精神正是其通变求新、与时俱进的条件和思想基础,也是湖湘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

“双百”方针付诸实施初期,学术界和文艺界如沐春风,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可惜由于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和国内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这个良好的开端出现了严重曲折。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确立“双百”方针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才真正以博大的胸怀,兼容并蓄的态度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四、独立根性与“古为中用、洋为中用”

近代中国的文化交流是在落后挨打的屈辱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充满着列强残杀和掠夺,因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虽有满腔的爱国激情,但闭塞自守、固步自封的排外情绪使近代中国更加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给国人带来极大的困惑和纷争,是“保存国粹、闭关锁国”、还是“全盘否定、全部西化”,五四以来,文化界关于此问题的争论,各执一端,莫衷一是,出现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观点。毛泽东立足于丰厚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汲取湖湘文化中“独立根性”的“恃己”精神,继承了马恩列斯,特别是列宁的对文化遗产批判继承的思想,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方针,倡导客观看待文化传承与推陈出新的联系,理性认识列强文化侵略渗透与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差别。

湖湘文化的鲜明特征是敢为天下先的“独立根性”的奋斗精神,湖湘文化诞生的地理环境极其封闭,在先秦时期为烟瘴潮湿的荆蛮之地,文物教化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文化,“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4]。战乱频仍、民性强悍,一度被视为“南蛮”,虽然环境如此恶劣,但湖湘大地依然“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5]。因为远离政治中心,皇权意识淡薄,从另一方面激发了湘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精神,人们百无可恃,唯有自己的意志和能力可恃,所以湖南人杰特别强调无所依傍独立自主的“恃己”精神。王夫之说:“恃人者,不败足矣,未有能成者也,而所恃者,终在己也。”^[6]曾国藩亦推崇人的独立性:“我辈办事,成败听之天命,毁誉听之于人。惟在己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随众人之喜惧为喜惧耳。”^[7]左宗棠提出:“自强之道,宜求诸己,不可求诸人,求人者制于人,求己者操之己。”^[8]杨毓麟论及湖湘哲学、史学、经学、政治等领域独领风骚的原因:“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自濂溪周氏师心独往,以一人之意识经纬成一学说,遂为两宋道学不祧

[1]《船山全书》第1册,〔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074页。

[2]《魏源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页。

[3]《杨昌济文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203页。

[4][5]钱基博:《湖南近代百年学风》,〔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5页,第35页。

[6]《船山全书》十册,〔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387页。

[7]《曾国藩全集》16卷,〔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2年版,第6112页。

[8]《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2,第33页。

之祖。至于直接船山之精神者,尤莫如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独往,是何也?曰:独立之根性使然也。”^[1]可见独立根性的“恃己”精神正是湖湘精英冲决束缚、敢为人先的精神源头,也是湖湘文化在近代风雷激荡的历史舞台上举世瞩目的深层原因。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记有:“有独立心,是为豪杰。”^[2]

得益于湖湘文化的浸润,毛泽东的文化个性中“恃己”精神是相当鲜明的。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肯定民族文化遗产的历史地位和存在的价值,强调要有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不闭关自守、不盲目排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巧妙地将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和实现民族复兴的事业结合在一起。毛泽东指出:“我们绝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3]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优秀的民族传统,因此,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合理的继承传统文化,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国自己的文化,可以激发爱国主义的热情,摒弃奴化思想,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量,因此不能否定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国的文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4]“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5]这一主张及时纠正了“五四”运动前后出现的否定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的倾向,为吸收、借鉴古今中外先进文化指明了正确方向,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指出要善于吸收和借鉴外国文化,反对固步自封的排外主义和“全盘西化”论的主张,“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6],在毛泽东看来,学习外国文化,必须是有批判、有分析的,要重在吸收,不能盲目地照抄搬用,要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对于外国先进文化,秉承为我所用的原则,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去吸收和借鉴,用来改造和发扬中国的文化,才能创造出更为独特的中国新文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有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7]。毛泽东坚信一个民族必须有“恃己”独立的根性,才不会丧失民族自信心,才能正确地学习外国的长处,才能创造出有独特民族风格的文化作品,中国的文化才能克服自身的片面性,取长补短相得益彰而获得丰富与发展,把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有机地统一起来,在中西文化交流融合中,使得民族文化生机勃勃愈加光辉灿烂。

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湖湘文化精神内涵)因子,珍惜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坚持文化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方针,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继承原则,对于当前进一步深化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深化文化认同,实现民族复兴之梦,依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积极的启示作用。

[责任编辑:史拴拴]

[1]杨毓麟:《新湖南》,[长沙]《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3期。

[2]《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01页。

[3][4][5][6]《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2页,第535页,第707页,第706-707页。

[7]《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53页。